

不要肢解列寧名言

歷史與空間

■ 安立志

由於東海、南海的風雲變幻，近年來，愛國主義成了熱門話題，網絡上不僅出現了「愛國者」與「愛國賊」的紛爭，現實中也屢屢發生抵制「洋貨」、打傷同胞的「愛國」案件。當然，也有一些做法具有建設性，有人在網上貼出了中外名人關於愛國主義的名言。

這些名言，有的是對愛國主義的讚頌，有的是對愛國主義的批評。美中不足的是，網上貼出的這些名言，往往只在後面綴上名字，卻懶得註明出處（比如抄引的書籍及頁碼等），從而削弱了其準確性與可信性。我不否認一些名言具有時空的普遍性，有些名言畢竟是前人針對當時、當地的特定問題發表的意見，如果在理解上脫離了具體的歷史情境，就很難把握其思想脈絡與哲理涵義。

古代中國尚未形成現代國家，在傳統的家國情懷之下，人們的愛國情感，很難擺脫忠君思維。而西方哲人關於愛國主義的論述，多數中國讀者則感到比較陌生。在我們這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國家裡，馬克思和列寧自然具有他人所無法比擬的權威性。

談到馬克思，人們往往冠之以「世界公民」。馬克思作為革命導師，早年放棄德國國籍，此後流亡西歐，屢遭驅逐，終老英倫，至死也未能葉落歸根。因此，不僅馬克思生前極少談論愛國主義，就其一生際遇與理論創造而言，將愛國主義強行植入其思想體系也不科學。何況兩位創始人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曾明確宣佈過「工人沒有祖國」。談到「愛國主義」，列寧的思想足夠權威。1918年11月20日，他在《皮季里姆·索羅金的寶貴自供》一文中指出：「愛國主義是由於千百年來各自的祖國彼此隔離而形成的一種極其深厚的感情。」（《列寧全集》第2版第35卷，頁187）這一論斷往往被視為列寧對愛國主義的定義，至今仍被奉為主臬。

提到列寧這一論述，不能不提《布列斯特和約》。《布列斯特和約》是「一戰」中蘇維埃俄國同德意志帝國於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今屬白俄羅斯）簽訂的條約。它是列寧為保住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被迫採取的妥協行動。和約使蘇俄退出了世界大戰，為蘇維埃政權贏得了喘息時間。這個苛刻的和約，不僅使蘇俄喪失了波

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芬蘭和白俄羅斯一部共約10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和近五千萬名居民，而且損失了佔全國煤炭開採量的90%、鐵礦石的73%、54%的工業以及33%的鐵路。與此同時，還要向德方交付60億馬克戰爭賠款。這一和約，顯然是一個割地賠款的屈辱條約。因此，在談判過程中，列寧的動議遭到強烈的反對和抵制，反對的理由之一就是愛國主義。

列寧對愛國主義的闡述，從字面看，似乎是對愛國主義的肯定和讚頌。人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從總體上，從根本上，列寧是反對愛國主義的。因為按照愛國主義的理由，列寧的妥協計劃就無法實施。在內地近年的愛國主義喧鬧中，列寧的「定義」被頻繁引用。不過，許多引用都是斷章取義的，實際上是對列寧思想的肢解與分割。在列寧的「定義」中，「彼此隔離」才是關鍵詞。正是由於「彼此隔離」，愛國主義才成為封閉、狹隘、保守、孤立的產物。可見，列寧對愛國主義的闡述，本質上是貶義的。在原書同頁，就可看到列寧對愛國主義的否定：「我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特別巨大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困難，就是它不得不經過一個與愛國主義斷然決裂的時期，即《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列寧全集》第35卷，頁187）他進一步指出，「小資產階級由於自己的經濟地位，比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更加愛國。」（同上）意思是說，整天招搖愛國主義旗幟的往往是一些眼界比資產階級還要狹隘的小資產階級。

和約剛剛簽訂一周，也就是1918年3月11日，列寧在《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文中，就批評了一些反對簽訂和約，並對德國義憤填膺的俄布黨員，「仇恨德國人，打擊德國人——這始終是通常的愛國主義即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口號。」（《列寧全集》第34卷，頁77）列寧在這裡提出了「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概念。可見，在他眼裡，「通常的愛國主義」是有姓「無」姓「資」之分的，既有無產階級愛國主義，也有資產階級愛國主義。這與我國網絡上關於「愛國者」與「愛國賊」的爭論可謂異曲同工。

1918年11月27日，在列寧就愛國主義作出「定義」一周後，他再次強調：「在這方面起了



■ 大家對列寧名言的引用許多都是斷章取義。

網上圖片

很大作用的，是我們的革命同愛國主義作了鬥爭。我們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曾經不得不反對愛國主義。我們說，如果你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你就應當為國際革命而犧牲自己的一切愛國主義情感，……」（《列寧全集》第35卷，頁208）不僅要與愛國主義「作鬥爭」，而且要「反對」愛國主義。列寧的用語奇怪嗎？可見，列寧在處理國內外事務時，比狹隘的、局部的、暫時的愛國主義，具有更為廣大、更為全面、更為長遠的眼光。四個月之後（1919年3月18日），列寧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強調指出，「愛國主義，這正是小私有者的經濟生活條件造成的一種情感。資產階級比小私有者更國際化。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當蘇維埃政權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於一切民族犧牲的時候，我們就碰到了這種愛國主義。」（《列寧全集》第36卷，頁121）在列寧看來，由於「祖國彼此隔離」而形成的「極其深厚的感情」，其實是一種「小私有者」的「情感」，而蘇俄當時的「愛國主義者」只是一些「小私有者」的團夥，「他們（小私有者）在無產階級革命日益成熟的時代，曾經用舊愛國主義觀點來看問題，他們的看法不僅是非社會主義的，而且是根本不正確的。」（同上書，頁122）可惜的是，這種「根本不正確的」「非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在我國竟被當作絕對的「政治正確」。由此可見，系統地、全面地把握前人的思想，不僅僅是學風問題，「語錄病」實在誤人不淺。

世事滄桑。列寧100年前建立的蘇俄政權已經煙消雲散，俄羅斯土地上如今的當政者對列寧當年的舉措作出了新的評價。今年年初，俄羅斯總統普京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蘇俄單方與德國及其盟友簽署了《布列斯特和約》，「幾個月後德國投降了，而我們卻敗給了戰敗國。這真是歷史上所罕有的。為了什麼？為了爭奪政權。」（2016年1月26日新浪新聞）普京所說的當是另一種愛國主義。

書若蜉蝣

■ 葉輝

從亞里斯多德說起

一名考古學家較早時聲稱他相信已發現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陵墓，他在希臘北部主持一項為期20年的發掘工作；話說在希臘塞薩洛尼基舉行的一個紀念亞里斯多德誕生2,400周年的會議上，希臘考古學家康斯坦丁奴斯·斯曼尼迪斯（Konstantinos Sismanidis）發言時指出，雖然還沒有證據，但有極為明顯的跡象支持他的說法。

陵墓在亞里斯多德的出生地斯塔基拉古村落發現的，位於塞薩洛尼基以東約40英里，據斯曼尼迪斯所指出，亞里斯多德於公元前322年去世後，人們修建此座建築來紀念他；他說：「我們已找到陵墓，還發現古代文獻中提到的祭壇，以及通往陵墓的道路，與城市聚落內的古市場非常靠近。」

雖然陵墓主人身份的證據是間接的，但卻具備幾個特徵：其位置及廣闊視野；位於一片方形大理石地面的中心，乃至其修建時期，約為希臘化時期剛剛開始的時候，也就是亞里斯多德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在公元前323年去世之後；斯曼尼迪斯認為，「全部都支持一個結論：此一拱形結構遺址乃亞里斯多德基祠的組成部分。」

亞里斯多德出生於公元前384年，他乃柏拉圖（Plato）在雅典的學生，他的作品構成現代邏輯的基礎，他的形而上學成為基督教神學的一個固有組成部分；而他的著作《詩學》（Poetics）對戲劇原理的分析至今發人深省；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Philip

II）就邀請他為其子亞歷山大的導師。

2014年在希臘北部的安菲波利所進行的另一項發掘工作中，考古學家發現當地最大的古代陵墓——有人把那座陵墓與亞歷山大大帝聯繫到一起，引起媒體的興趣，然而，考古學家其後所得出的結論，則指陵墓有可能屬於亞歷山大大帝的親密友人。

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三世的名字意為「人類的守護者」；話說此位古希臘北部馬其頓國王到16歲為止，一直由亞里斯多德擔任其導師；及至30歲時，亞歷山大已創立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其疆域從愛奧尼亞海延伸到印度河流域；他一生未嘗敗績，被視為歷史上最成功的軍事統帥之一。

為了尋找並抵達「世界的盡頭和大海外」，亞歷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6年大舉入侵印度，然而，最終應軍隊的要求，不得不撤軍；及至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大帝死在巴比倫，沒有來得及實現他入侵阿拉伯的計劃；在他死去之後，由於無繼承人，他的將領們互相不服，最終引發內戰，亞歷山大大帝國也就迅速瓦解了。

話說亞歷山大大帝因擴充領土而導致的西方與東方的文化融合，他建立以其名字命名的城市，最著名的就是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他將希臘文化一直向東傳播，那才導致希臘化時代降臨，直到15世紀仍在拜占庭帝國中，發現此等痕跡；他以古希臘神話中的戰神阿基里斯（Achilles）為偶像，最終他亦成為一個近乎神話的人物。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四十六）

唐代高僧釋元

可分夜好
惜明深個
人照圓玉
間出待台
煙須老天
樹彌僧上
寒路看月
。 。 。

唐代高僧釋元詩
素仲配畫
甲午初秋

釋元（生卒不詳），釋一行弟子。在唐中宗期間，高僧一行到廣東新會圭峰山，在山巔結庵，釋元等五百人相隨。後釋元為座首，因圭峰山有黃雲之異景，又名黃雲山，故釋元又有黃雲元禪師之稱。圭峰山頂「挺拔玉立，其頂四方」被稱為「玉台」，寺稱為玉台寺。高僧在月圓之夜，坐禪之際，借月抒懷。玉台山上的明月，為人間照出一條光明的佛法之道，可惜，世人卻未懂追隨，但見煙樹一片蒼茫。高僧有普渡衆生之心，惜世人未有追隨之意。

啟悟隨筆

我祖籍新會三江鄉，釋元的詩令我很感親切。在廣州出生，從未回過家鄉。童年看過族譜，父親是宋室走難到三江的後人。廣州是達摩祖師初來之地，又是六祖惠能隱姓埋名十五年後，現身弘法之處，故此，名寺很多，有法性寺、南華寺、光孝寺（內有達摩井）、海幢寺、大佛寺、華林寺、六榕寺……在這樣的宗教氣氛下我生活了十五年。

詩詞偶拾

■ 韋剛 譯

水仙

——《The Daffodils》:William Wordsworth
英湖畔詩人威廉·華滋華斯（1770-1850）原著

我聞蕩着似浮雲一片，
越過峽谷和群山；
驀地裡眼前忽現，
一叢水仙金光燦然：
在那湖邊，在那樹下，
在微風中曼舞翩跹。

湖波也隨着輕移舞步，
但哪比得上花兒風度？
生活在這歡樂的懷抱，
詩人怎能不樂也陶陶？
我但願凝視，卻沒想到：
這景色也賜給了我多少財寶！

如同群星在宇際爭妍，
也似天河的光華射衍；
花叢展向無窮天際，
沿着海灘委婉伸展。
满眼盡是金盞千萬，
搖曳生姿妙舞翩跹。

多少次當我靠在椅上，
孤寂地憂鬱冥想；
那花兒啊就是呈現眼底，
撫呵着我的寂寞憂傷，
我心潮遂又激揚歡暢，
共水仙一道起舞翱翔。

作者註：英國春天山谷滿開水仙，金盞銀盃，形態與我國春節時喜見的水仙相同。值此時刻翻讀名詩人華滋華斯名篇佳句，更有共遊各地名山幽谷享受春天氣息的期盼。

豆棚閒話

千古知音最難覓

■ 韓小榮

上世紀80年代，家裡買了一台收音機。初次聽李谷一演唱《知音》，立刻沉浸在那種纏綿悱惻的悲情氛圍裡。那時，我正處於多愁善感的青春期的，聽着聽着，眼角居然濕潤了。聽不清歌詞具體是什麼，只恍惚覺得有一句是「千古知音最難覓」。

人到中年，已經學會了遇事波瀾不驚，情緒相對穩定。閒暇時刻，為了給生活增加點情趣，我喜歡聆聽一些古典音樂。學會手機上網之後，我下載了蝦米音樂。首先搜索到李谷一的《知音》來聽，聽到那久違的唱腔，再度被李谷一精湛唱功傾倒。這智能手機還真是善解人意，聽音樂的同時，可以看到字幕彈出來。反覆聽了幾遍，《知音》歌詞一字不差記住了，「將軍拔劍南天起」，如此氣吞山河，豪情萬丈，這將軍到底是誰？請原諒我的後知後覺，我通過百度才知道了李谷一演唱的《知音》原來是電影《知音》的主題曲。電影講述的是蔡鐸和小鳳仙的愛情故事。看了電影，才知道南天拔劍的是護國將軍蔡鐸，情願化作長風繞戰旗的是小鳳仙姑娘。

古典瞬間

英雄美女，惺惺相惜，生逢亂世，都以大局為重，不計個人得失。在蔡鐸眼裡，小鳳仙絕不是低賤的聲妓，她高貴優雅，聰慧機智，能處變不驚，識民族大義。蔡鐸將軍曾經寫了一首詩，贈與小鳳仙。「不信紅顏終薄命，自古俠女出風塵」，這是對小鳳仙的期許和盛讚。因為知音，所以俠義。小鳳仙果然不顧自身危險，盡心掩護蔡鐸離開袁世凱的軟禁。

知音說與知音聽，不是知音莫與彈。當小鳳仙得知蔡鐸病重，她傷心欲絕，獨自撫琴，真正是如悲如啼，如泣如訴。最後，琴弦崩斷，小鳳仙預知了蔡鐸將不治。一曲《知音》傳天下，從此生死兩茫茫。情深意長難斷守，怎不教人痛斷腸！

人生在世，愛恨情仇。誰不渴望得遇知音？古人云：聲氣相求者，謂之知音。這就不難理解，化作蝴蝶翩翩而飛的是梁山伯和祝英台，而不是馬文才和祝英台。就算是把馬文才和祝英台埋在墳裡一萬年，他們倆也不能化蝶。因為他們倆不是聲氣相求的一對。老百姓常說，

秤桿離不了秤砣，梁山伯就是秤桿，祝英台就是秤砣，馬文才卻不是定盤的星。

劉蘭芝和焦仲卿也是聲氣相求的一對。惡婆婆百般刁難，導致了劉蘭芝「攬裙脫綵履，舉身赴清池」，焦仲卿「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他倆合葬華山旁，松柏梧桐，交相覆蓋，鴛鴦來棲，長鳴不已。

楊玉環本來是壽王妃，為什麼不能守貞，卻給唐明皇做了妃子？這也是因為聲氣相求。楊玉環懂音律，明皇是她的知己。她們在一起，身心愉悅。雖然結局不怎麼美好，也許他們在乎的是過程呢！愛過方無悔，像煙花一樣，只要曾經燦爛，化為灰燼又有何妨？

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因為難求，所以心動。大詩人徐志摩曾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我將在茫茫人海中尋訪我唯一之靈魂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靈魂的伴侶，非知音而何？這段話道出了世間所有癡男怨女的心曲。得與不得，都是個人造化。千古知音最難覓，惟願孜孜以求的人們有情人終成眷屬。

■ 龔敏迪

白居易對李世民的歌功頌德

《續資治通鑑》載：宋太宗曾興致勃勃地問侍臣：「我比唐太宗如何？」左右近臣自然無不交相稱讚，唯有李昉不置一言，還吟誦起白居易歌頌李世民的詩句：「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給宋太宗當頭潑了一盆涼水。

不過後人對於白居易的歌頌發出了疑問，因為「怨女三千放出宮」，放出的都是他老爹李淵的女人，又不是他自己的女人。《資治通鑑》記載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李世民說：「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洹水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問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李百藥說的「往年雖出宮人」，是指二年前的武德九年，李世民剛奪了帝位，就下詔說的：「宮女眾多，幽閉可愍，宜問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這人。」李淵的宮人，曾是李世民、李建成都要拉攏的對象，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拿她們來出氣，並用以為自己收攏人心，又屬理所當然。

對於「死囚四百來歸獄」的不以為然就更多了，歐陽修的《縱囚論》就說這種不

近人情之事是：「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唐太宗知道釋放囚犯回去，他們一定會回來以希望被赦免，所以才釋放他們！如果釋放了回來的就按國法殺掉，然後再釋放一批，囚犯又回來了才證明是教化的作用，但他們一定不會回來了！這種事之前發生過多次了，清人趙翼的《陔余叢考》指出：縱死囚歸家始於後漢的馬援，自後漢、兩晉、南北朝至於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縱囚的，共有二十餘次。比如南朝宋東陽太守王誌縱囚、北齊齊州刺史張華原縱囚、北周上州刺史蕭協縱囚、隋初齊州慘軍王枷縱囚、唐初萬泉縣丞唐臨縱囚，無非都是作秀而已。清代王夫之也認為李世民縱死囚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騙局：「太宗陰授其來歸則赦之旨於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為盛治，或詭為非常」。王夫之以為當時，「法令密而蘆弁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囚之縱者雖欲遁逸，抑誰為之淵藪者？」戶籍和連坐制度尤為完備，邊關的管理也相當到位，要想逃出去，幾無可能。死囚們既無處可逃，又無處可藏，還得冒宗族親戚遭受株連的風險，他們怎麼

可能不乖乖回來？連朱熹也說：「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功耳。」於是，白居易的歌功頌德就要被人詬病了。然而，人們往往不能理解，文學性的宣傳與歷史事實之間的微妙關係，文學性的宣傳為的是當下的一時性，其很多細節往往經受不起歷史真實性的考證。白居易說的是「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拿一百九十年前的事來說的，是他對於所生活的元和年間現實的不滿。開國皇帝高祖、太宗的事，常常被大臣們說成「祖宗之法」，用以堵繼承者的口是有很多好處的。「祖宗之法」是不能批評的，一批評論就危及繼承者自己的地位，所以歌功頌德總是必須和不會錯的，經過了一百九十年的歌功頌德，它們的真實性和正義性也已經不容置疑，虛假的也成了真實的了。所以白居易說：「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子孫就是心知肚明李世民的把戲，也只好像開飯店的那樣，在眾目睽睽之下，把落在食客飯菜裡的死蒼蠅吞下肚裡去，更何況當時的唐憲宗未必能看透李世民玩的把戲。